

牟宗三

◎王岳川 编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学

术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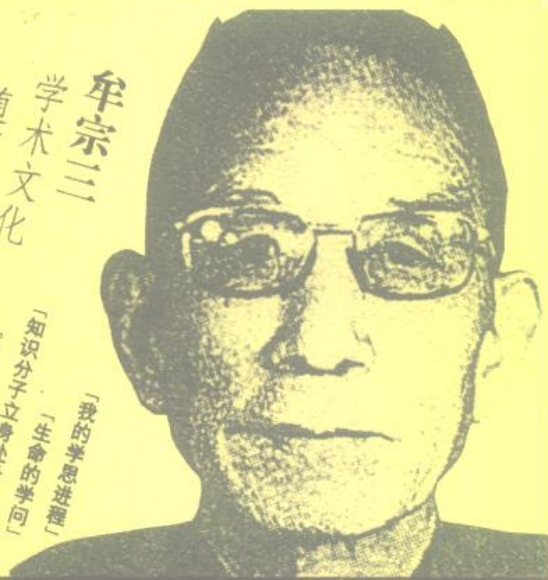
化

随

笔

牟宗三
学术文化
随笔

- 「我的学思进程」
- 「生命的学问」
- 「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之道」
- 「关于文化与中国之道」
- 「略论道统、学统、政统」
- 「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
- 「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
- 「东西两民族之生活原理之未来」
- 「物自身与现象之基本不同」
-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之意义」
- 「佛性与般若」序





国防大学 2 063 143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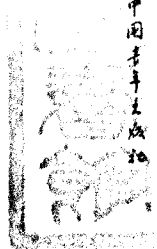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牟宗三

学术文化随笔

● 王岳川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牟宗三学术文化随笔/王岳川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9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2281-3

I. 牟… II. 王… III. 牟宗三—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018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0.5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6.90 元



总序

百年中国，沧桑巨变。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

GDZ80/13

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故尔出现了新转型的学说——新儒家、新道家；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得以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是开窗敞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莱、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意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学界究竟该接受谁？是全盘接受而搞非历史的横向移植——全盘西化（极端的激进主义）呢？还是部分接纳——半盘西化（温和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即只接受古希腊的民主、科学

精神，不要希伯莱的宗教精神和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只接纳近代启蒙理性精神，不接受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精神呢？是拒斥西方文化的渗入，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必要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呢？还是承认中国文化可以借鉴西方走创造性转型之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不仅讲求形而下，关注事实世界领域，而且讲求形而上，关注价值世界问题呢？甚或，像当代某些后现代文化批评家那样，只要所谓“新”的反理性、反理想、反启蒙、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不要现代性或民主、科学、真理、启蒙、公正，而走向经济消费主义和生命玩世主义（当代虚无主义）呢？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生存意义的迷失、价值的失落，是终极关怀和生命理想层面的问题。

就学术文化史而言，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而且，在世纪末，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遭遇到中国传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这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种古今、东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

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时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方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今天，在中西文化开始“对话”和“交流”进程中，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西方轨道或把西方学术范畴强加于中国，而是要找出一条转型性创造的学术文化之途，寻绎到学术文化的普遍理性形式，以使东西方文化思想得以沟通和互补；不是要使真理、正义、理性、启蒙让位于语言游戏和价值虚无，而是秉承刚健清新的中国文化精神，面对风云变幻的“后冷战”国际舞台，调动知识和心性来扩充智慧与精神，用普遍的文化知识和理性的方法，来表达现代人的胸襟和生活价值观，来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内在智慧和超越精神。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焕发精神生命跃动中的内在光辉；只有通过批判性价值重建，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文化无国界。东方深厚的文化精神无疑对人类的明天仍有滋养作用。华夏文化理应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表意方式，藉此，消解西方中心话语

向第三世界播撒的权威性,打破第一世界文化的中心性,展示本土新文化的和谐清新风格,并指明走向新世纪的新的可能性。

真正的学者将生命和学术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生存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揭底。他以理性和语言去探索人性中的未知领域,在现代人的情感萎缩中唤醒对存在状态的思考,投一束思想的光亮去照澈幽昧的思想暗夜,在严峻的学术文化追问中寻找中国文化生命的真正意义和未来远景。能以真血性、真情怀去担当一个世纪的苦难并开出新境界的是真正的学者、哲人。

回首二十世纪,一代代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世纪立言,为中国文化立心。学者们殚思竭虑,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大视野中去审视,放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去对比:或关注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对中国原典进行现代阐释;或注意中国文化中的学统、道统、政统关系,期望在道德理想主义中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或关注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问题,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汇合;或身处“政治与学术之间”,从事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学术研究;或以高人逸士的风范,吞吐中西的胸襟洞察心性灵魂而独出机杼写出诗性感悟;或独标“散步哲学”,在“流云”般的自由思想中寻求人类精神安顿的“家园”。哲人们以本真生命为底色,以人类面临的世纪灾难为基点,为这千纪年的世纪末转换发出新世纪的“天问”——问向天人之际,问向古今之变,问向灵肉之间。

在一个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术大师和优秀的学者

以其超迈的胸襟和翼翼独造的胆识为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在碑文上镌刻着这样的大字：重建文化，再铸国魂。在文化转型中的价值稗史时代，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申说着华夏人格精神魅力，并留下一份沉重的“未来千年备忘录”。

编选这套百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旨在立足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审视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历程，并进而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景。“大系”分为两个系列：“系列一”主要选编业已去世的现代思想学术大师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示大师们对中国文化的体验、理解、反思；“系列二”选编当代著名学者的代表性篇章，以展现当代学者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反思、研究、探索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大系”分五辑（每辑二十卷），五年内出齐。严谨的思想体系、求实的学术品格、素朴的编辑作风是我们编选这套大型丛书的追求。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原作风格及其时代感，作品的行文造句、用词用字基本保持原貌。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观念，一个时代的思想者有其处身时代的思想烙印。相信今天的读者会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重读”、“重释”这些作品的意义。

愿这套丛书在寻求心灵对话的途中与你相遇。

是所望焉，谨序。

王岳川

一九九四年岁末于北京大学

总序/王岳川

第一编 心性篇

- 我的学思进程/3
生命的学问/15
直觉的解悟/19
我的存在的感受/39
知识分子立身处世之道/47
-

第二编 文化篇

- 关于文化与中国文化/65
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87
中国文化大动脉中的终极关心问题/100
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之历史文化的意义/112
两种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不同/125
略论道统、学统、政统/152

第三编 哲学篇

- 中国有没有哲学? /167
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176
中国哲学的未来/193
东西两民族之生活原理之基本不同/203
宋明儒学概述/209
物自身与现象之分之意义/240

第四编 序文篇

- 《从周易方面研究
 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自序一/255
《历史哲学》三版自序/259
《道德的理想主义》修订版序/269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序/272
《现象与物自身》序/278
《才性与玄理》序/297
《佛性与般若》序/300

牟宗三年谱简编/309

跋：生命与学术/312



第一编

心性篇



第一编 心性篇

我的学思进程

我这一生，是处在中华民族大变动的时期。我是民国前三年，也就是宣统元年出生，中间经过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国号洪宪）、张勋复辟、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八年对日抗战及至于今又是四十年。总之中华民族最动荡不安的近百年，我是亲眼见到的。这一百年变动的经过，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而我个人亲身经历、感受这个时代，在思考应如何把握这个时代，如何了解、领导这个时代？

配合著名哲学家康德思考人类理性的问题

我思考的经过，虽出自个人，但却和整个时代有关。这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整个说来，是文化的问题，也是人类理性的问题。我想从我个人感受的角度，来谈谈这个经过。我一生从事于哲学思辨，既未从事政治活动，也不曾经商，也无“安邦定国之大业”。抗战八年，我没有到前线打日本鬼子，没有“汗马功劳”，

既未参军，也未做官；我只在后方走遍西南各省，只陪着整个民族的苦难受苦，可以说只有“苦”劳，没有功劳。对于现实国家的遭遇，我不是行动的参与者，而只是一个旁观的人，是一个旁观的生命，只有在现实上陪着受苦。我自北大哲学系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

哲学家康德一生八十多岁，也没有从事过别的事情，以三部曲（《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为他主要的哲学纲领，思考人类理性中所涉及的一切问题。这三大批判所代表的一整个系统，并不简单，杜威有一套，罗素有一套，海德格尔有一套，甚至怀特海、胡塞尔均有一套。“套”多得很，但内容价值完全不一样，这是大家所应当郑重了解的。

我一生是配合着康德的思考来了解人类理性的问题，到现在仍然在了解康德第三批判的问题。康德自己构思了一“套”，是从自己生命中的真知灼见而发，消化处理了以往哲学家的一切业绩而予以恰当的衡定。他像唱戏一样，有板有眼、有规有矩。这世上那么多哲学家，有那么多套，有几个能“合板眼”的呢？这实在很难。我也没有康德那样的本事，他能从自己的生命里直接就人类理性所牵涉的一切领域所有的学问，独立构思一套来加以说明与衡定。我这一生也八十多岁了，我从大学读书开始，就配合着康德一生所思考的问题来思考。我并不是一个“康德专家”，一生也并非只念他那三部曲。我是通过读古典文献，来配合他的思考，例如我写的《才性与玄理》，是说明中国魏晋时代的思想。另一部《佛性与般若》两大册，是我退休后写的。我并非佛弟子，但

我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全部经过，吸收后如何消化，消化了以后如何又开宗，开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但这三宗在佛教与人类理性里占了什么地位呢？这有多少人能了解呢？下一阶段是宋明理学，我用了八年时间来整理这六百年期间的思想而成《心体与性体》三册，后又出第四册《从陆象山到刘蕺山》。这六百年重新讲述儒家的学问，现在有多少人能了解这六百年的用心所在呢？我所用的心思和工夫都是整理古典文献，但在整理中我同时也注意康德思考所发出的问题。

我到台湾这些年，出了不少书。《佛性与般若》是在这里印的，《心体与性体》是在这里印的，后来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也是在这里印的，我写的《现象与物自身》，还有《圆善论》（讲最高善（The greatest Good）），也是在这里印行。这是主要的几部大书，也都是配合康德来思考，但我非只读康德三大批判，而也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献，来把握民族的智慧。

化生命的疏隔与畅通

现在大家的生命都隔了，不能与民族生命、化生命相通。通不起来，就整天胡言乱语，到处乱骂，没一句正当的话。大陆上出了本《河殇》，说黄河流域已经没落了，它的文化创造力枯竭了，奶水已干了。其实我们并非没有水喝，没有奶吃，而是说《河殇》这些话的人是“饿鬼”。文化之水没有停流，是自己“作孽”，见了水不能喝，见了饭不能吃。佛教所谓的“饿鬼”，乃是眼前明明是大米饭，你看是沙子；眼前明明是水，你看是火油。

沙子不能吃，火油不能喝。但为什么会把大米饭看成沙子，把水看成火油呢？这是你的罪孽深重，所以受到这样的果——成了饿鬼，看不见文化的水。去了解文化生命的发展和学术传统，是多么重要的事。可是自从民国以来，甚至从明朝亡、清军入关以来，文化生命就断了。这样一来，文化生命上下不通气，怎能吸收西洋文化，又怎能现代化？所以了解了中华民族过去的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了解了古人，也就了解了康德。先让自己的文化生命具有生气，才能了解西方的文化生命。

在这将近一百年的大动荡时代，我是无奈地闹中取静，透过对古典的疏导，来了解康德所启发的理境。但为什么不能配合罗素或杜威呢？或再往前讲，为什么不配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呢？我不能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配合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是有道理的。希腊传统固然精采，然开不出道德主体，故亦开不出真正的价值之源。希腊传统足以开学统，但开不出道统，不能作为终极的智慧方向。民国初年，罗素曾访问过中国，被视为西方圣人，但罗素那专讲数理逻辑，特尊逻辑分析的思想形态，怎能配合人类理性的活动之全部，怎能依之来了解中国文化之方向呢？胡适宣传杜威学说，杜威是实用主义。其实胡适所了解杜威的程度很差，但他享有大名，这种大名对中国社会并无实质裨益。胡适所了解的杜威思想，其实只是《如何去思考？》(How We think?) 这个小册子，其他著作可能均未涉猎，以这种程度来吸收西方文化，怎么够资格讲现代化呢？瞎嚷嚷是没有用的，这些人其实是反对现代化的。但是他们讲科学、讲